



作为军镇制陪都之唐北都太原研究

丁海斌 张思慧

摘要:唐代北都太原为中国古代史上较典型的军镇制陪都。其地理环境优越,战略地位突出,李渊更凭借太原起兵反隋进而建立起了强大的唐王朝。北都的官制、兵制与城制都极具军事特点。北都以总管府统军戎,以身兼尹、节度使等职的留守管理军政事务。北都常有大量驻军镇守太原,军事力量极为雄厚。北都有山川河流、险要关隘组成的天然城防和与自然地势结合而建筑的隍堑、羊马城、城墙三重外卫体系等,这些防御设施加上大量驻军使太原成为一座坚固且防卫体系完备的军镇。北都太原在唐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袭扰、平定安史之乱以及维持藩镇平衡上具有重要的军事作用。北都太原是唐王朝重要的军镇制陪都。

关键词:唐;北都;太原;军镇制;陪都

中图分类号:K241;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6-0097-09

军镇制陪都是中国古代十大陪都类型^[1]中一种较为重要的陪都类型。唐代北都太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典型的军镇制陪都。本文从太原成为军镇制陪都的原因与过程、北都的官制、兵制、城制以及北都太原的特殊历史作用三个方面来展开对唐代军镇制陪都——北都太原的研究。

军镇制陪都的概念是丁海斌提出来的,指的是以军事功能为主的一种陪都类型。此前学术界对这一类型陪都还缺乏专门性的研究。目前,对唐代陪都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京制陪都洛阳,研究方向以政治、经济为主,对北都太原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李渊起兵和武则天与太原的关系上面,学者的视野还没有重点关注唐代北都太原的军镇制陪都的属性上面。由此,本文对唐代北都太原作为军镇制陪都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挖掘、梳理与解读,彰显其军镇制陪都的属性,并借此达到对中国古代军镇制陪都进行典型剖析之效。

一、唐代太原成为军镇制陪都的原因

唐代太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拱卫北方的军镇制陪都,是由它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唐代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自然条件方面,太原周围有众多大山大河为天然屏障,地理环境优越。唐代社会环境方面,唐初政治局势尚不稳定,内有刘武周等隋朝余将的猛烈攻击,外有突厥等族屡次犯边。一旦太原被敌方所占,就会威胁两京。其突出的战略地位,加上又是龙兴之地,为唐朝统治者所重视。诸多因素使军事重镇太原跃升为大唐(武周)北都,成为当时除两京之外最重要的陪都。

(一)唐代的战略要地

太原地处山西腹地,可谓表里山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东阻太行、常山(即恒山,今河

收稿日期:2020-07-21

作者简介:丁海斌,男,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 530006),主要从事档案学、中国古代史研究。张思慧,女,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曲阳西),西限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门、五台诸山之险”^{[2]81}。关山环列与四面八方的山川河流环环相扣形成多层结构的天然屏障,可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屏护太原以及中原腹地。

太原军事交通发达,与北塞、长安、洛阳、河北等方向有诸多交通线,还有汾河水运,十分便捷。“并州地处参墟,城临晋水,作固同于西蜀,设险类于东秦,实山河之要冲,信蕃服之襟带。”^{[3]1458}

“太原……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4]860}太原处于农牧交界之地,战事频发,是抵抗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回纥南下的前哨阵地。“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5]335}“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6]1671},是控制北方全局的“天下精兵处”^{[4]1116}。当时,唐代边疆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突厥等游牧民族,太原控扼北部之咽喉,是两京与中原腹地的北大门,是加强对黄河以北地区控制的重要城池,因此成为中央王朝和割据政权都很重视的战略要地。

(二)历史上多次成为首都、陪都的唐代一都之会

太原古为重镇。“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4]860}春秋战国时,六卿之一赵简子为争取战略优势派董安于修筑晋阳城并以此为都,得以称雄,与韩、魏三家分晋。赵国以太原为都达74年。秦汉时,太原郡是抵御匈奴的边防重镇。西汉时韩国、代国、太原国都曾建都晋阳。魏晋南北朝时,太原为多个割据政权立国建都之地,先后被匈奴汉国、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占有。北魏尔朱荣据晋阳窃取北魏政权。高欢以其为霸府控制北魏政权。高洋凭借晋阳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北齐并以此为实际权力中心,“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州既齐氏别都,控带要重”^{[7]485}。“晋阳,国之下都,每年临幸,征诏差科,责成州郡。”^{[8]367}北周伐北齐,即以重兵直指太原,倾其巢穴,消灭北齐。

太原不但是历史上多次成为首都、陪都的

重镇,而且也是唐代的一都之会。唐代太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都很发达,经济基础雄厚,为北部边疆军事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这也是太原成为军镇制陪都的重要因素。太原地势较高,西有晋水,东临汾河,南有昭余祁藪,“方圆数百里,烟波浩渺”^{[9]177},水源十分充足。“酈元《水经注》曰:‘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分为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灌溉,东南出城注于汾水。’”^{[10]55}河水路过的地方皆年丰稔熟,物产丰富。

诸多优越条件,使太原成为李唐起家之地。

(三)龙兴宝地

太原是唐朝的龙兴之地,其在李渊建唐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唐书·高祖本纪》载:

十三年,为太原留守……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11]1-3}

太原“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11]2375}。太原府库充实,为李渊起兵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十一月丙辰,李渊攻克长安,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即帝位于长安,正式建唐,是为唐高祖。终唐一代,李氏统治者对龙兴宝地感情深重,奠定了其成为北都的重要基础。

二、太原成为军镇制陪都的过程

唐代太原具有特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具有成为陪都的客观条件。但其正式成为陪都还有着具体的事件触发和渐进的过程。

(一)军镇太原的发展

太原在隋代就是重要军镇,兵备所在。太原为隋四大总管府之首,“夫总管府者,兵备所

在”^{[12]62}，“有事镇遏也……设险守国之地也”^{[12]62}。隋文帝曾诏令屯兵数万以御突厥。开皇十六年（596年），并州总管秦王杨俊在晋阳城建仓城大量储备粮饷和军用物资。十九年，并州总管“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4]1245}。晋阳储备丰沛的军事物资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为李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为长久抵御突厥提供了武力支持。

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太原是隋在北方所控制的最重要的据点，是中原稳定的命脉，安危得失关系大局。“炀帝后十三年，敕帝（李渊）为太原留守。”^{[13]2}以抵御突厥，安定内乱。六月“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11]3}。李渊以军镇太原为基地开始了反隋创业之举。义宁二年（618年）“高祖即皇帝位”^{[11]6}为了应对北部突厥和内敌刘武周等的军事威胁，高祖李渊“罢郡为并州总管”^{[14]361}。

武德四年（621年），“改为上总管”^{[14]361}，武德五年（622年），“为大总管府”^{[11]13}。当时全国只有洛、幽、并、荆、交为大总管府，而代、岷、弘、灵、定等重要的军镇只为总管府，可见并州在全国地位之重要。武德六年（623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11]14}。武德七年（624年）二月，“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11]14}。“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粮食、镇戍等。亲王为之，多遥领。其任亦多为赠官。长史居府以总其事。”^{[15]472}“凡辖十州以上者称大都督府，其时国内称大都督府者凡洛、幽、并、荆、交五州是也。”^{[16]136}庆、夏、嵩等重地虽为都督府但级别属于中下等，低于并州大都督府。即便是在后来景云二年（711年），朝廷以为权重难制，罢除都督府，唯四大都督府如故。并州为四大都督府之一，地位仅次于两京，可见其重要性。自贞观初年起，安定时期地区的都督府的职能转为民政成为地方行政部门，唯边境军事活动重地仍持强大的军事功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并州都督府，而洛、扬、益等则向民政职能转变^[17]。

太原是唐朝重要的军事重镇。由起兵之初的大将军府到大都督府，地位不断跃升。最后，由军事重镇跃升为大唐北都。

（二）高宗武后巡幸太原

高宗武后时期，太原地位又有所提升。“则天皇后武氏讳曩，并州文水人也。”^{[11]115}武则天对故乡太原有着特殊感情，此亦为武则天后来设太原为北都的原因之一。

贞观十一年（637年），武则天踏入宫门。“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11]115}显庆五年（660年），帝后同行，巡幸武后故乡太原。史载：

春正月甲子，幸并州。二月辛巳，至并州。丙戌，宴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赐帛有差。曲赦并州及管内诸州。义旗初职事五品已上身亡歿坟墓在并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起义之徒职事一品已下，赐物有差。年八十已上，版授刺史、县令。佐命功臣食别封身已歿者，为后子孙各加两阶。赐酺三日。甲午，祠旧宅，以武士覆、殷开山、刘政会配食。

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族邻里故旧于朝堂，命妇入入会于内殿，及皇室诸亲赐帛各有差，及从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乡并州长史、司马各加勋级。又皇后亲预会，每赐物一千段，期亲五百段，大功已下及无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及诸妇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赐物等。己酉，讲武于并州城西，上御飞阁，引群臣临观。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丁巳，左右领始改左右千牛。^{[11]80}

北巡晋阳是在临近出兵高丽之时，高宗在此举办讲武活动有利于鼓舞士气。这不仅为衣锦还乡的武则天增加了荣光，也表示出对龙兴之地的独特情怀和重视。这也为武则天称帝后设太原为北都埋下伏笔。

（三）武周代唐与太原北都的设置

武则天执政期间，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

麟德元年(664年),“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18]6342}。武则天权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从此唐高宗“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18]6343}。

弘道元年(683年),“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18]6416}。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11]121},武则天正式成为武周皇帝。

武则天时期,后突厥帝国崛起兴盛,常进犯唐朝。“永淳二年,进寇蔚州……文明元年,又寇朔州……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其年八月,又寇朔州……贼众遂散走碛北。”^{[11]5167}突厥屡次进犯直逼太原,国内不断有旧势力起兵反对,想要除祸解忧必要依靠强大精锐的武装支持,出于政治、情感尤其是军事等方面的考虑,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武则天将“并州改置北都”^{[11]123},兼都督府,军事重镇太原始称北都。武则天以心腹大将神庆擢拜并州长史,并对他说:“并州,朕之粉榆,又有军马……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11]2689-2690}垂拱年“免并州百姓庸、调,终其身”^{[19]85}。天授改文水“为武兴县,以天后乡里县,与太原、晋阳并为京县”^{[11]1481},“给复并州武兴县百姓,子孙相承如汉丰、沛”^{[19]91}。北都的设置对防御突厥稳定边疆具有重要意义。中宗即位后,废并州北都称号。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复置北都,改并州大都督府为太原府。天宝元年(742年)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年)肃宗罢太原府北京称号。宝应元年(762年),代宗复太原府北都之称,以后终唐之世不改。

总之,在武则天年间以及前后的数十年内,突厥频频进犯,兵锋触及河东地区中北部的朔州、蔚州、代州、忻州,直逼并州,将军事重镇设为北都无疑有利于提高河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加强河东地区的军事防务,抵抗突厥入侵,也能起到强化拱卫神都洛阳的作用,突出了太

原作为神都洛阳北方门户的地位。

唐代(含武周)设置陪都较多,分别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中都蒲州、南京成都、西京凤翔、南都江陵等,京师长安在武周时亦为陪都。所以,唐代是中国古代陪都制兴盛的时代。总体而言,在这些陪都中,北都是地位仅次于两京的重要的军镇制陪都,与两京并称“三都”。

三、唐(武周)北都太原的官制、兵制与城制

作为唐朝(武周)重要的军镇制陪都,北都太原在官制、兵制、城制等方面都显示出浓厚的军事色彩和陪都特征。唐初太原置总管府乃至大都督府统管军务,后期以太原尹、节度使、留守等总管太原军政大事。天然屏障和环环相扣的城市防御设施加上大量兵马的驻守,使得太原俨然成为一个独立、坚固的军事基地。

(一)北都太原的行政官制

中国古代陪都的行政体制多为留守制,唐北都亦然。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三都:京兆(都西)、河南(都东)、太原(都北)。”^{[20]42}“(唐)西京、东京、北京留守通称,或称三都留守。”^{[21]358}

武则天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22]1280},多兼天兵军大总管等职。开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为太原府,“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谓之三都留守”^{[19]1311},仅次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地位十分崇高。府尹下属官吏甚多:牧各一员,尹各一员,少尹各二员,司录参军二人,录事四人,功仓户兵法士等六曹参军事各二人。

留守制是北都官制的主要特征和核心。留守居武职之首,地位极为尊崇。与东西两京留守常以中央官员担任相比,北都留守具有比较显著的军事特征,并身兼众多武职,这是军镇制陪都的重要官制特点。唐制,“两京、北都留守给麟符……北方诸州玄武符……行军所亦给之”^{[19]525}。“麟符:相传麟为仁兽,其形如牛,腹黄色,一角,角端有肉,代表中央。因京师、东京、北都太原都代表中央,故两京、北都均给麟符。”^{[23]536}太原为玄武符,具有调兵之权。“发兵

符’,以铜为之,左者进内,右者付州、府、监及提兵镇守之所,并留守应执符官人。其符虽通余用,为发兵事重,故以发兵为目。‘传符’,谓给将乘驿者,依《公式令》:‘下诸方传符,两京及北都留守为麟符,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两京留守二十,左十九,右一;余皆四,左三,右一。左者进内,右者付外州、府、监应执符人。其两京及北都留守符,并进内。”^{[23]535}

唐代北都留守,皆由国家重臣担任。“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11]627}两京以政治经济等职能为主,而北都以军事为主,故必须选具有军事才能的武职长官来担任,以便洞察军事、处理军务。“太原王业所起,国之北门,非勋德烂然者不能镇定,特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于是修班制,正事典,险其走集,训其舆师,讲车徒战阵之法,教金鼓声气之节,分画之下,变化如神。自是烽候罢警,匈奴不敢南向而牧矣。”^{[24]299-300}

与东西两京官员由中央派任相比,北都留守拥有很大的独立自主的权力。“‘朕从北门兴王故地……可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等使。’制下,许自择参佐……时中朝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11]4169-4170}与其他军镇相比太原是统治者唯一允许自择参佐的军镇。常规军事职责有开屯田、铸兵器、训士卒、理军务等。北都留守能够高效地集结一切物资和力量用于军事活动,为唐中央保家卫国、开边拓土,此亦为军镇制陪都官员的重要职责。

这与东都留守、西京留守相比具有鲜明的区别。东都留守为常任官职,最初是李世民出征高丽,设置留守看管,兼尚书、府尹等,“管钥换离宫”^{[25]1154},具掌管宫钥之责。西京留守一般是皇子或德高望重的文职官员在皇帝离开时暂时看管,保证西京安全和正常运营的,后不常设。

(二)北都太原的驻兵镇守

军镇制陪都的特点在驻兵镇守方面有着重要的体现。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东都、北都、雍、荆、扬、益州,置左右司马”^{[19]1309}。罗凯认为北都地位仅在神都之后,武周政权的都城,只

有神都与北都,长安暂时失去了都城地位^{[26]184}。如果把并州防御突厥的使命联系起来,武则天以之为北都,也能起到强化拱卫神都洛阳的作用,突出了并州作为神都洛阳北方门户的地位^[27]。

唐初,太原府有府20仅次于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其数量甚至比山南道、剑南道、江南道等还要多。河东道的太原是突厥骑兵入侵的要冲,是唐重要的军镇,因此折冲府设置密集。

唐在并州置天兵军,其军力强大,其他军镇不曾置,并州天兵军,治所晋阳。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置,管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置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一千二百匹……大同军……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安边郡东北百四十里,开元中河东公张嘉贞移置,管兵七千八百人,马一千八百匹……安边郡……管兵三千人。定襄郡……管兵四千人。楼烦郡东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管兵千人。东南去理所三百五十里。岢,音胥”^{[28]409}。“开元五年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28]103}张嘉贞将这些强悍的草原牧民编入边防军系统,使军镇制陪都太原的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开元八年(720年),唐改天兵军大使为天兵军节度使,治所晋阳,管辖兵力3万人,马5500匹,提高了天兵军的地位。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复置北都。时晋阳与长安、洛阳并称“三都”^{[19]1311}。二月,唐改天兵军节度为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河东道支度营田使兼北都留守,领太原等9州,治太原。可见太原在北方的军事地位。

开元十八年(730年),唐改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治所晋阳。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至天宝年间“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岁百二十六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天兵军,理太原府城内,管兵三万人,马五千五百匹。云中守捉,

在单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二千匹”^[11]1386-1387。太原府天兵军三万,仅次于凉州赤水军,远远多于檀、妫、交、灵等其他军事重镇。由此可见,太原城的兵马数量相当庞大。这为其军事职能提供了极大的依仗。

(三)北都太原的城防设施

军镇太原具有天然的防御屏障。东有太行为屏障,其西有吕梁山为之固,“于北则有大漠、阴山为之外蔽,于南则首阳底柱、忻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逢关皆吾门户也。汾、浹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隔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诉龙门,则径渭之间可折棹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邵郛井径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敌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6]1635-1637。其四面皆有屏护,使其本身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防御体系。相比两京需互相依仗无法单独作战,太原尽显优势。

军事重镇太原居其腹地,形成环环相套的防御体系,是长安、洛阳都不可比拟的。“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6]1670周边有娘子关、龙山、蒙山、卧虎山、石岭关、天门关、赤唐关等诸多山脉、关隘形成小防御体系,可谓“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6]1671。太原屏卫黄河以北,是长安、洛阳重要的屏障,更是边防要塞、“国之北门”。

太原城城防设施十分完善。“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门二十四。”^[29]23城墙高四丈坚固宏大,比长安城高出一丈五尺。西城有大明城、新城、仓城连成一线,为太原盆地以北到晋中平原的要冲。武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擢拜并州长史。因谓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11]2689-2690崔神庆到任后“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11]2690,即为中城,由南北两道城墙组成有“汾水贯中城南流”^[14]362,每年省防御兵数量达千人之多,增强了东西城的防御能力。不仅利于士兵和物资的调动,便于战时互为声援,而且隔绝汾河,可防备敌人从水上攻城,形成坚不可摧的犄角之势。

太原城有汾水、晋水两大护城水系。马燧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成为护城河,与天然屏障汾水共同构成了太原城严密的护城体系。北都还有多种防御设施,有高楼、高台、双重墙体、瓮城、壕堑,城外西北方还有用于军事防卫的罗城,形成了一座坚固的防御型城市。与其他军镇相比最为突出的就是羊马城。“此为城墙外的一道低矮城,在壕堑内离城十步处,高八尺至一丈,上建有五尺高的女墙。”^[30]3与城、壕构成三层立体防御网,利于军队隐藏和阻止打击敌人,保护作用极大。

而两京的军事布防是一个整体,实力强悍,但不能独自防御作战,东都无有利的天险可守,敌军极易从河北平原长驱直入威胁长安。一旦两京之一受到军事威胁,便无法向两边派援兵。相比之下,北都的防御体系相对独立,具有进行单独防御作战的能力,进可攻退可守,既能率先派兵驻守支援北部,又能防守保卫南部,极具军镇制陪都的优势。

四、作为军镇制陪都的唐代太原的历史作用

太原作为唐朝重要的军镇制陪都在唐代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北都是唐北方之门户,又是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地,一直承担着抵御北敌的重要作用。在安史之乱中,太原得保则河陇得保,河陇得保则天下可保,一旦失去太原,两京便会受到直接威胁,那么李唐政权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北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拱卫中央,遏制河北藩镇,平衡残局,稳定了唐朝的统治。

(一)北都太原对唐朝抵御外敌的作用

军镇制陪都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对外抵御异族势力的入侵。太原是唐朝抵御北方突厥的重要军镇。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唐朝建立后,始毕屡发兵助刘武周、梁师都侵扰河东地区。武德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骑攻雁门;次年六月“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南侵西入灵,原等州……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八

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11]5157}。

面对突厥的进攻“置总管府,以统军戎,至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11]1384}。这是唐北御突厥的重要军事机构。“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绩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绩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11]2486}太宗委任具有军事才能的国家重臣镇抚河东,以防御突厥。

唐政府以军镇太原为后方基地,积极屯田修筑备战反击突厥。武德元年(618年)至二年(619年),“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上表,请与太原多置屯田,以省粮运……竟从静议,岁收数十万斛,高祖善之。六年,秦王又奏请益置屯田于并州界,高祖从之”^{[31]6035-6036}。贞观时,唐太宗利用突厥的天灾人祸进行了反击。“八年,突厥寇并州,命绩为行军总管……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贞观三年,为通汉道行军总管,至云中,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于碛口,遣使请和……贼营大溃,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绩屯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渡碛,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绩,虏五万余口而还。”^{[11]2485-2486}李世绩统兵十余万,分道出击突厥,最后颉利可汗被俘,反击战争取得胜利,从此唐北疆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安抚震慑也是保障边疆安定的重要手段之一。“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挾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汹惧。秋,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18]6740-6741}又“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18]6728}。大量驻军可震慑抚慰各族,以防少数民族叛逃生变,保边境安定。

可见,作为李唐政权的发祥地和重要军镇,北都充当了防御突厥的“长城”。它的军事防御

特征在防御突厥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北都太原对平定安史之乱的作用

军镇制陪都太原的军事功能还体现在平定安史之乱上。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区,只剩山西顽强抵抗。太原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备受唐和叛军的重视,双方竞相争夺太原。

对唐而言,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是其抗击叛军,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军镇。玄宗派金吾将军程千里到太原,临时募兵数万人抵抗叛军。天宝十五年(756年)李光弼被举荐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李光弼到任后亲自率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陉,与郭子仪合兵,连败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至德元年(756年)肃宗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1]3304}。在河北又被叛军占领的情况下,安史叛军集中重兵争夺太原,以扫除河北与长安之间最大的阻碍。李光弼“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11]3304}。

二年,贼将……率众十余万来攻太原。

光弼经河北苦战,精兵尽赴朔方,麾下皆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谓诸将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环辄补之。贼城外詈骂戏侮者,光弼令穿地道……光弼率敢死之士出击,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军资器械一皆委弃。贼始至及遁,五十余日,光弼设小幕,宿于城东南隅,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11]3305}

史思明率部十万进攻太原,认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18]7015}。李光弼在太原的保卫战中沉着应战,粉碎了叛军攻取太原进而夺取河陇以摧毁唐朝廷的幻梦,从而使唐掌握主动权,稳定了全局。其中不乏晋阳城有效地发挥了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

北都太原保卫战对于时局影响十分巨大。此战牵制了大量叛军,使唐肃宗能从陇右、河西、西域等地调集军队,同时也截断安禄山旧

路。大量叛军被消灭,使其攻势不再。唐朝廷从各地集结的援军也已达10万余人,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

政治上,太原是唐发祥之地和北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旦失守,会给唐朝廷以极大的打击。军事上,北都是唐朝廷抗击叛军的前沿阵地和军事重镇,其是否失守是决定成败的重要环节。一旦失守,为安禄山所据,叛乱势力便可联结周围地区,成犄角之势夹击长安。同时向山东、陕西扩展,占据整个北方,甚至统一全国。可见,太原保卫战对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性,以及太原作为军镇制陪都在平定内乱、维持中央统治的重要军事作用。

(三)北都太原对唐后期制衡藩镇的作用

唐后期,北都作为军镇制陪都能够有效防遏河北藩镇,“掌北门之管钥,控朔塞之河山”^{[32]9070}。河朔藩镇原是叛将,所掌兵力强劲,离心力强。这些藩镇初建起就利用“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11]3895}的机会,“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置属,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11]3895-3896},建立起自己的割据统治,给唐王朝带来巨大的威胁。

河东节度军担负有拱卫中央、防御河北的重要作用。史载:“夏,四月,乙未,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18]7230-7231}这次讨伐战争的胜利,河东节度军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河北地区将帅也时常感叹河东地区对其的掣肘之态,可见,河东地区已经成为遏制河北的重要棋子,是制衡藩镇,维持唐政府持续运作的重要一环。“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33]13082}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内忧外患,似乎不堪一击,却又残存一个半世纪,是因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动态均衡,河东就是维持这种平衡的重要环节。

面对军事上的重任,加强戎备成为节度使

为务之要,故河东节镇常宿数万重兵。大历末年,马遂担任河东节度使,“骑士军弱,遂悉招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驱。又造战车,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卫;器械无不精利。居一年,得选兵三万”^{[18]7260}。到元和时期,王锬任河东节度使,经营河东,“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18]7681}。同时,军队的壮大也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这一区域的赋税也基本上留作自用,以维持强大的驻军。“河东属于中央神策军遥控的外防吐蕃、回纥,内御河北叛镇的军事重镇……不申报户口,不向中央缴纳赋税。”^{[34]227}总之,太原地区作为重要军镇和军镇制陪在安史之乱后常驻重兵,不仅重新建立起了防御外番的重要防线,也起到维系藩镇平衡的重要作用。这些亦是军镇制陪都太原的独有特点。

结 语

太原是唐朝重要的军事重镇,也是中国古代史上典型的军镇制陪都。太原处四塞之中,内控天下,自古以来就是重要军镇,是割据势力盘踞之所。唐代太原地位更为重要,既为李唐龙兴之地,亦肩负抵御北敌之重任,是唐北方的门户。对外御敌,对内安抚震慑,拱卫两京,保卫中央政权的稳定。北都太原汇集了唐北方的军事力量,军事作用辐射到广大的北部疆域,太原安稳则河陇无虞,河陇无虞则天下稳定。军镇太原由总管府到大都督府再到后来集留守、尹、节度使于一体的军镇制陪都,拥有极大的军政权力。其天然屏障与城防设施紧密结合,加上大量驻兵,提高了北都太原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北都太原成为唐朝除两京之外的最重要的军镇制陪都。

参考文献

- [1]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十大类型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1-86.
- [2]靳生禾,谢鸿喜.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董浩.全唐文:2[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邓瑞.马端临与《文献通考》[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 [6]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7]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8]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历史卷上[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 [10]范晔.后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1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岑仲勉.隋书求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13]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M].李季平,李锡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杜佑.通典:上[M].长沙:岳麓书社,1995.
- [16]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7]李青森.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4):66-77.
- [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王应麟.小学绀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1]龚延明.简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 [22]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1-5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23]长孙无忌,袁文兴,袁超.唐律疏议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
- [24]权德与.权德与诗文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5]黄勇.唐诗宋词全集:第3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 [26]罗凯.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
- [27]齐子通.武则天设置北都时间及其背景考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4):109-116.
- [28]胡建林.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2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 [29]高春平.晋商与明清山西城镇化研究[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 [30]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5[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1]王钦若.册府元龟: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2]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4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3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4]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

A Study on Taiyuan, the Northern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Accompanying Capital of the Military Town System

Ding Haibin and Zhang Sihui

Abstract: Taiyuan, the C of the Tang Dynasty, is a typical accompanying capital of the military town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With its superio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inent strategic position, Li Yuan relied on Taiyuan to fight against the Sui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a powerful Tang Dynasty. The official system, military system and urban system of the northern capital have great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The northern capital was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and military services, and stayed behind to manag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as well as Yin and Jiedu envoys. In the north, there are often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stationed in Taiyuan, and the military force is extremely strong. In the north, there are natural urban defense composed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dangerous passes, and the triple external defense system of Huang Qian, Yangma City, and city walls, which are combined with the natural topography. These defense facilities, together with a large number of garrison troops, make Taiyuan a solid military town with a complete defense system. Taiyuan, the northern capital, played an important military role in resisting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pacifying the An-Shi Rebellion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the clans in the Tang Dynasty. Taiyuan, the northern capital,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and town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northern capital; Taiyuan; military town system; accompanying capital

[责任编辑/周 舟]